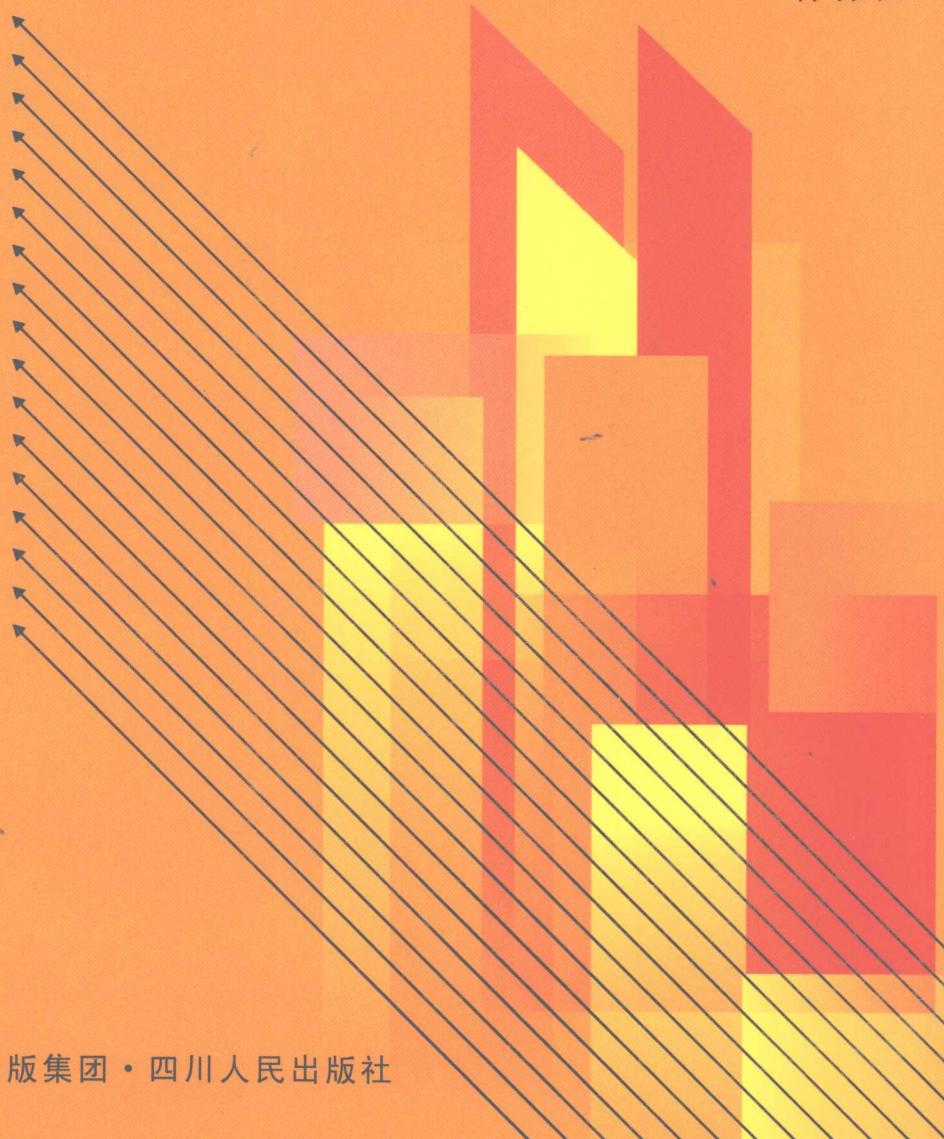




改革开放30年书系

# 中国奇迹 与中国发展模式

韩保江 著



# 中国奇迹 与中国发展模式

韩保江 著

ZHONGGUO QIJI  
YU ZHONGGUO FAZHAN MOSHI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 / 韩保江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220-07700-5

I. 中… II. 韩…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②改革开放—成就—中国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3655 号

ZHONGGUO QUI YU ZHONGGUO FAZHAN MOSHI

### 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

韩保江 著

策划组稿	刘周远 李洪烈
责任编辑	李洪烈
封面设计	文小牛
技术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叶 勇
责任印制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网 址	<a href="http://www.scpph.com">http://www.scpph.com</a> <a href="http://www.booksss.com.cn">http://www.booksss.com.cn</a> E-mail: scrmcb@sc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524
照 排	四川上翔数字制印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嘉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5.75
插 页 数	3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7700-5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 目 录

代序：解密“中国奇迹” .....	1
导言：中国发展模式值得研究 .....	12
<b>第一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生成过程 .....</b>	<b>17</b>
1.“改革开放”催生中国发展模式 .....	17
2.“渐进式改革”孕育中国发展模式 .....	35
3.“善于学习”造就中国发展模式 .....	41
4.“勇于结合”生成中国发展模式 .....	45
5.“中国特色”升华中国发展模式 .....	48
<b>第二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传统基础 .....</b>	<b>58</b>
1.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 .....	58
2.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苏联模式 .....	65
3.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	71
4.改革开放前的自主探索 .....	78
<b>第三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外来经验 .....</b>	<b>89</b>
1.东欧经验的滋养 .....	89
2.美国模式的借鉴 .....	98
3.北欧模式的启示 .....	104
4.日本模式的启迪 .....	110
5.拉美模式的教训 .....	118
<b>第四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制度框架 .....</b>	<b>128</b>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128

2.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134
3. 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 .....	139
4. 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配合 .....	144
5.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促进 .....	149
<b>第五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运行动力 .....</b>	<b>154</b>
1. 物质利益驱动力 .....	154
2. 战略目标感召力 .....	159
3. 多种经济竞争力 .....	164
4. 国际竞争挤压压力 .....	168
<b>第六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支撑条件 .....</b>	<b>173</b>
1. 高资本形成率 .....	173
2.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	179
3. 不断改进的经济效率 .....	183
4. 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 .....	186
5. 消费结构显著升级 .....	190
6. 基础设施的全面改善 .....	193
<b>第七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实现途径 .....</b>	<b>199</b>
1.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199
2.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	203
3. 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 .....	208
4.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 .....	213
5. 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	217
6. 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 .....	220
<b>第八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运行机理 .....</b>	<b>225</b>
1. 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发力” .....	225
2. 自组织与他组织“相互补充” .....	227
3. 两类企业家的“积极作为” .....	231
4. 独立自主与全面开放“统筹协调” .....	234
5. 强政府与有为政党“和谐一体” .....	236

结束语:走好自己的路 .....	240
主要参考文献 .....	243
后 记 .....	247

中国发展速度之快令世界刮目，中国经济奇迹之大令世界震惊。而要真正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奥秘，就必须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去聆听普通百姓的心声。

## 代序：解密“中国奇迹”<sup>①</sup>

韩保江

随着中国经济 27 年的高速增长及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以其独特的立场来审视中国创造的“经济成长奇迹”，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无论这种探讨出于什么目的，其都为国人全面认识我国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我们克服经济成长过程中的“烦恼”拓展了思考的空间，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一、全球瞩目“中国神速”

改革开放 27 年来，中国经济始终持续高速增长，按照中国官方统计，从 1979~2005 年，中国平均年实际 GDP 增长率高达 9.7% 左右。它不仅远远高于同期的美国（3.0%）、德国（1.9%），而且大大高于曾经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日本（2.6%）和韩国（6.5%）。对中国经济跑得如此神速，国外政界和学界既担心，又羡慕。担心的是如果中国如此高速地发展，早晚会取代它们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羡慕的是中国的发展潜力无国能敌。正像美国学者马修·沙恩和弗里德·盖尔所言：“自从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超过 8% 的年均增长速度，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和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相比。”也正是如此，中国的 GDP 总量一举从 1978 年的 1473 亿美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22450 亿美元，增长近 15 倍；人均 GDP 从 1980 年的 173 美元增加到 2005

<sup>①</sup> 此文是在我 2006 年在美国杜克大学学习时撰写的结业论文《中国经济奇迹：成因与问题》（原文为英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发表在《中国经济观察》2006 年第 3 辑，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3 页。

年的 1733 美元，增长近 10 倍，经济总量一举超过了英国和法国，位列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不足 1%，提高到现在的 4.5% 以上。

这样，“在其他国家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获得的发展成就和变化，中国只用了 20 多年。由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 3%，其获得今天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用了超过 100 年的时间。日本在 1971 年至 1991 年的 20 年黄金发展时期，年经济增长率也只有 3.85%。其他‘亚洲奇迹’国家或地区也从来没有像中国发展得这样快。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马来西亚在 1971 年至 2003 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分别只有 7.06%，7.35% 和 6.53%。”因此，中国今天在国际经济中的分量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都非昔日可比。说来外国学者也很有意思，他们为到底怎样估量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经常“口水官司”不断，起初是怀疑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有“水分”，存在“高估”的嫌疑。但近来他们又认为用现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价来计算中国经济总量有“埋伏”，说是被严重“低估”了。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同一货币单位的人民币与美元在中国和美国所购买商品的价值量没有现行两国汇价那么大的差距。对此，美国学者莫里森认定，中国按现行汇率标准核算的 GDP 总量肯定是被低估了。因为不仅中国的许多商品和服务价格明显低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而且许多非货币化指标，如寿命期望值、婴儿死亡率、日摄取热量、人均电视拥有量等都可以和比中国人均 GDP 高许多的如泰国、马来西亚和巴西等国相媲美。这些都说明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要比其以美元汇价计算的 GDP 总量所表现的水平高许多。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多外国学者和国际机构认为，应该用购买力评价标准来计量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要比现在中国政府公布的以人民币美元汇价计算的 22450 亿美元要大得多，应该是 91130 亿美元，人均 GDP 也不只 1733 美元，而应提高到 7182 美元。这样，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41000 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乐观估计，只要中国继续深化改革，中国经济不仅在未来 10 年可以继续保持 7%~8% 的高增长率，而且其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 GDP 将在 2020 年之前超过美国进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即便较悲观的估计也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最迟 2040 年可以赶超美国，2016 年超过日本。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2002

年，中国对世界新增 GDP（按购买力评价）的贡献率为 21.31%，美国为 21.09%，日本为 5.81%，德国为 3.04%。其中，在 1980~1990 年，美国对世界新增 GDP 的贡献率最高，为 21.25%，中国为 12.25%，名列第二，日本居第三位，为 10.56%；在 1990~2002 年，中国对全球新增 GDP 的贡献最大，上升为 27.09%，美国退居第二位。因此，中国已经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快速成长“当之无愧”的火车头。

## 二、“中国奇迹”的奥妙何在？

揭开“中国经济何以高速长期增长”的奥秘，无论是国际机构，还是国外学者都乐此不疲。有的借助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着重研究要素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的吸取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营养，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有些外国学者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因于中国的高资本形成率、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和日益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根据人力资本投资和制度变迁理论，有些国外学者更看重中国的教育事业、体制改革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如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成长的贡献。概括起来他们认为，五大主要因素支撑了中国过去 27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第一，“高投资”驱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应该说，较高的资本形成率是许多亚洲国家创造经济增长奇迹共同的特征。日本从 1953 年开始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其高达 35% 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率（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新加坡在 1971 年至 1985 年间的高速发展时期，其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率超过 40%。马来西亚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也有几年高速增长的时期，而它在此时期的固定资本形成率也超过 40%。因此，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高资本形成率和大规模投资是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引擎。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奇高”的资本形成能力和高投资率呢？国外学者都普遍认为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一是中国具有高储蓄率的传统。“省吃俭用”是中国老百姓的传统美德，“多、快、好、省”是中国政府开展经济建设的一贯指导思想。因此，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9 年中国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其国内储蓄率就已高达 32%。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有过一次消费高潮，但

总体来讲，高储蓄始终伴随并驱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一路高歌猛进，平均超过49%，2004年虽然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已经达到46%，但其储蓄余额占GDP的比重则从2000年的1.9%增加到2004年的4.2%，并仍呈现上升的势头。与此相比，2004年美国的储蓄率只有10.7%。也正是如此，美国学者对中国何以获得如此之高的投资动力百思不得其解，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成为推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众多的外国公司被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所吸引，而大举投资中国。一时间，中国变成了巨大的“资本洼地”。据中国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年均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83年的6.3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603亿美元，平均年增长15%。截至2005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总额达到6180亿美元。外资的大量流入，不仅补充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而且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中国内资与外资的巨大“合力”不仅表现为量的扩张，而且还伴随基础设施的巨大改善、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升级和技术的进步，所以它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贡献巨大。根据美国学者海坦斯和载伯瑞格斯等人的估计，高投资对每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直接贡献要在4.7到6.4个百分点之间。

第二，“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有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比较优势，一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不仅每年都有近10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而且在广大乡村有超过1.5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到城市就业。二是“人优价廉”。中国的劳动力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质量也不低。由于追逐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天性，“人优价廉”的劳动力资源就像一个“强磁场”，强力吸引着跨国公司的投资，进而使中国真正成为了“世界工厂”。因此，造就了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工业制成品领域无与伦比的竞争力。在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的供应商当中有80%来自中国。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沃尔玛的供应商当中来自美国之外的才只有6%。根据沙恩和盖尔的研究，“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对中国年均增长率的直接贡献每年都在1个百分点左右”。

第三，“效率改进”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固然得益于高投资和廉价劳动力等因素，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功

不可没。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归因于体制改革、技术改善和劳动力技能的提高等诸多方面。一是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从僵化的集权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各种生产要素被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门或经济领域，使各种生产要素得到更加高效的运用；二是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不仅带来巨额资本，而且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而促进了中国劳动生产率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三是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人力资本积累大量增加，劳动力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这更直接地促进了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程度，海坦斯和载伯瑞格斯估计，“在 1971 年～1998 年期间，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每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都在 2 至 3 个百分点之间。”

第四，“剧增的国际贸易”拉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自 1980 年以来，中国始终把对外贸易发展作为拉动和支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政府不仅主动减少国际贸易的政府垄断和控制，降低贸易壁垒，而且积极谋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这些政策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逐年增加，进而迅速成为当今世界位居美国和德国之后的第三贸易大国。国外学者认为，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快速的出口特别是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从需求方面不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对此，沙恩和盖尔认为：“解释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大小的最好的工具莫过于其中国日益攀升的贸易顺差”。自从 1990 年以来，由于中国对外出口增长迅速，贸易顺差逐年提高，这就为中国释放其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和过剩的机电生产能力提供了国际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大量的稀缺资源进口从保障供给方面不断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近年来也通过国际贸易进口了大量的国外先进设备和自然资源，这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水平，而且部分地弥补了其某些资源不足的“缺口”。如此形成“大出大进”的“玄机”，它不仅使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强劲的外在需求拉力，而且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供给支撑力。

第五，“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保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和托马斯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组织的效率来源于一套能够对经济主体行为进行激励的产权制度安排。毫无疑问，中国经济 27

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因为随着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被集权的计划体制压抑了的经济发展潜力被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出来，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而且各种非公有经济成分，如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根据我国官方统计，截至 2005 年底，私营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值对 GDP 的贡献已经超过国有经济，比重达到 65%。国外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将长期占有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尽管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的人均收入也不高，但它们都无法为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因此，只要中国继续保持改革开放，鼓励外资和其他资本投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中国还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

### 三、“中国奇迹”挑战重重

尽管国外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 20 多年获得的奇迹般的增长，未来一段时间这种经济增长的势头还将持续”，但他们强调，“这种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只有在中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下才能变成现实，如果不继续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那么，外国学者觉得哪些问题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呢？

第一，“消费需求不足”会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力”。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消费需求始终是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在 20 世纪 80 年代，消费需求对 GDP 增长的贡献曾平均超过 60%。但进入 90 年代以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这种下降的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在 2000 年至 2004 年间，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只有 61%，59.1%，56.8%，53.2% 和 54.1%。与此相比，美国的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平均高达 80%，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平均也高达 75% 以上。因此，消费比重低和消费需求不足，不仅会直接导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不足，而且可能会造成生产能力闲置和商品积压，进而不得不“畸形”地依赖“扩张投资”和“增加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尴尬“陷阱”。同时，扩张投资必然继续恶化“产能过剩”，过剩产能的释放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条件

下必然还要依赖扩大出口，扩大出口又必然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当然，导致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高投资率的“挤压效应”；二是居民不稳定的收入预期和消费支出预期诱致边际储蓄倾向提高；三是住房、医疗、教育等产品或服务价格昂贵。

第二，“自然资源短缺”会削弱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供给支撑能力”。客观地讲，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在一种比较“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实现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增长与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3年，中国的GDP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但却消耗了全球21%的钢材、31%的煤炭、25%的铝和40%的水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制造业的持续膨胀直接导致其能源和资源需求的急速扩张，而这也成为诱使全球石油和资源价格持续高扬的重要因素。”因此，外国学者认为，“有限的自然资源供给和石油、铁矿石、煤炭等生产资料价格的攀升将阻止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脚步”。

第三，“环境污染严重”会压缩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环境空间”。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和环境保护不力，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常常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由此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揭示，2004年，通过对中国七大水系412个观测点的抽样调查，受到污染的水面高达58%。全世界20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城市占了16个。30%的农田由于遭受酸雨的影响而减产。在过去高速发展的20多年里，每年由于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估计占到GDP总量的10%。

第四，“不平衡发展”会限制中国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一方面，城乡二元经济矛盾继续恶化，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发展能力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这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难题。据统计，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5年的3.22:1。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收益，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到5:1或6:1。因此，能否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而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将直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另一方面，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逐步扩

大。许多东部沿海城市的生活水平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被东部地区远远地甩在后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不仅使东部地区过剩的生产能力无处消化，而且使区域经济关系紧张以及民族团结问题日益突出，进而影响和阻碍中国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

第五，“不完善的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潜力释放”的桎梏。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体制不完善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影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进而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形成威胁”。首先，不健康的银行体系将成为威胁或延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大隐患。由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由政府主导并服务于国有企业，几乎很少考虑贷款者的偿还能力和贷款风险，所以许多贷款“有贷无还”，进而形成大量的不良贷款。据官方估计，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量高达3000亿美元。然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官方低估了其不良贷款的数量，认为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量可能超过6000亿美元。因此，外国学者认为，“随着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2005年中国将开放金融市场并允许外资银行经办各种金融业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导致的金融风险”。其次，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仍然影响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有企业就业的职工占城镇职工就业总数的59%，但到2005年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26%。尽管如此，由于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兄弟关系”及其在股票市场的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却占用和消耗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本。管理混乱和竞争力缺乏是国有企业较为普遍的现象。与此相比，广大的个体私营经济却表现出非凡的效率和活力。然而，它们不仅大多被排斥在股票市场之外，而且也很难获得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支持。融资难、贷款难成为制约中国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如此失衡的资本配置，极大地降低了社会资本的使用效率，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最后，巨额的财政赤字可能诱发财政风险，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埋下隐患。外国学者认为，中国近年来的经济繁荣与其实施较长时期的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有关。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总量平均超过其GDP总量的2%，这一比重在2000年和2002年期间又进一步扩大到3.5%。与此相比，作为财政赤字“巨无霸”的美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只有4%。尽管从2003年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并注意减少财政赤字，但是由于新的支出项目不断增加以及减税政策的实施，其财政赤字还将稳定在 2% 的 GDP 的水平，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偿还能力来讲，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当然，上述财政赤字是中央政府的债务，其中并不包括地方政府欠下的“大笔债务”，“许多乡镇和村债台高筑，政权组织面临‘破产’的危险”。尽管具体详细的地方政府负债额尚不清楚，但拖欠教师和政府工作人员工资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特别是中央政府实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以后，使原本就十分困难的基层财政更加“雪上加霜”。如果再考虑弥补巨额的养老金缺口和充抵银行不良资产所需要的财政资金，最终将导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和财政风险，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因此，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悲观地认为：“只要耐心等待，早晚还是可以看到经济灾难降临中国。因为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混合体，既包含符合市场规范的成分，也包含压抑市场的成分，而过去 20 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功归功于符合市场的成分，积累的问题则归结为压抑市场的成分。从而，当中国的经济‘转轨’从所谓容易阶段过渡到困难阶段后，问题就将超过成就。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的经济前景即使乐观地看也很不明朗，更有可能的是将出现危机。”

#### 四、续写“辉煌”，路在何方？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过去 27 年里，中国经济确实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长期高速增长“奇迹”。但是，要续辉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需要中国冷静，不要沉溺在高速增长的喜悦中，而应从长计议，深入挖掘驱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能源”。对此，西方学者也给我们提出了中肯甚至有些尖刻的建议：

第一，“振兴消费”迫在眉睫。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经济大国，其经济增长长期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在投资成本和贸易摩擦与日俱增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尽管高投资和高出口一直是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但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和国际贸易摩擦增加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如果不另谋其他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高速增长肯定无法持续。因此，切实启动国内消费需求这驾“马车”，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必然选择。针对

收入水平低、分配差距大、消费预期不稳定和投资挤压消费等诱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必须对症下药，采取有效措施“振兴消费”。为此，一是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城乡人民收入水平，调整和规范收入分配方式，提高处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们的收入水平。对具有“内需潜力”的农村地区要实行政策倾斜，不仅要继续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而且要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加快“新农村”建设，增强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对于城市地区，政府应该对职工最低工薪制度作出必要调整并严格执行，保证最低工资增长不低于物价上涨的水平。中国要切实执行新个人所得税法以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二要加快建立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特殊行业工作人员的津贴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三要保持稳定的个人消费预期，鼓励即时消费。通过努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彻底解决“上学难、看病贵、房价高”等问题，根本缓解人们对退休后生活保障问题的忧虑和消费支出的不稳定预期，进而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四是政府要着力改善消费环境和消费政策，改善住房条件和交通状况，积极开展和开办旅游业、文化活动、康体中心和其他服务性产业，适当调整现行的消费税，发展和规范消费信贷，清除或修订抑制消费的法规政策，刺激高端消费。许多国外学者都认为，中国唯有真正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摆脱过去单纯依靠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经济才能真正走上“成熟发展”的轨道。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只是“口号”。中国政府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口号”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了，但时至今日仍未落实的确需要反思。在资源价格高涨和全球竞争激烈的今天，中国必须寻找到一条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才能维持其经济的持续增长。否则，续写经济奇迹的愿望就会成为“泡影”。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应该在继续发展运输、能源和水利等基础产业和基础建设的同时，加速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化服务业，并在核心技术研发，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和标准等方面有所作为。

第三，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必须并重。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感兴趣，对中国由此带来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更重视。虽然他们当中有很多指责，但也有许多学者提出有益的建议，认为中国要想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就必须解决好其面临的资

源和环境问题。然而，要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就必须“两手抓”，一要抓体制机制建设，加快形成能够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用市场手段遏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二要抓技术与管理能力的提高，大力发展战略降耗技术，大力发展战略循环经济，加快建立保持生态平衡的机制，加强生态与环境保护立法，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唯有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才有可能持续，否则中国经济则在资源价格飞涨和环境恶化当中不断萎缩。

第四，改革和开放要坚定不移。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继续坚持改革，是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活力的前提条件。中国应该正视自己仍然存在的体制性问题，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要从政策上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培育对任何经济成分都公平合理的法律、政策和经济环境。为了社会公平和区域协调，中国还应特别注重公共财政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建设。同时，要切实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提高进出口产品质量，保持进出口平衡。

第五，建立“和谐社会”。国外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地区差距、城乡失衡、贫富分化和失业恶化等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不仅会破坏经济稳定发展赖以存在的社会稳定基础，而且会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因为作为中国社会“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的一极，不仅是中国不安定因素的“源头”，而且也是国内需求潜力的“源头”。因此，只有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注重分配公平，努力扩大就业，进而实现社会和谐，中国经济才能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否则，就会彻底动摇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根基。

## 结 论

用外国人的“第三只眼睛”去看中国经济持续 20 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不仅有利于我们清醒认识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源和存在的问题，还有利于增强我们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尽管由于他们有的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提出的质疑和责难有失公正，但可以从反面提醒我们要正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存在的问题和隐患，防微杜渐，进而续写中国经济高速、高效、持续增长的辉煌。再给中国 20 年，中国不仅将成为世界瞩目的世界经济大国，而且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